

周森龙 著

非虚构叙事艺术

报告文学研究

真实的事需要真实的叙事。叙事可否真实？真实可否叙事？如何达到
深度客观化的非虚构叙事与高度主观化的技巧性写作的统一？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

周森龙 著

非虚构叙事艺术

报告文学研究

真实的事需要真实的叙事。叙事可否真实？真实可否叙事？如何达到
深度客观化的非虚构叙事与高度主观化的技巧性写作的统一？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

内容提要

本书是研究报告文学的一部别有新意之作。从辩驳报告文学的生存状态始，溯渊源，考发展，探寻文体基本特性，辨析关键争议问题；论写作，从选题、采访，到叙事策略、叙事结构、非叙事话语的研究，以及人物报告的写作经验等，材料新颖，引证丰富，分析细致，新见独出，具有一定理论深度。

责任编辑：苏媛媛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非虚构叙事艺术：报告文学研究/周森龙著. —北京：
知识产权出版社，2011.1

ISBN 978-7-5130-0279-0

I. ①非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报告文学—文学研究
IV. ①I0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228760 号

非虚构叙事艺术：报告文学研究

FEI XUGOU XUSHI YISHU: BAOGAOWENXUE YANJIU

周森龙 著

出版发行：知识产权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海淀区马甸南村 1 号

邮 编：100088

网 址：<http://www.ipph.cn>

邮 箱：bjb@cnipr.com

发行电话：010-82000860 转 8101/8102

传 真：010-82000860 转 8240

责编电话：010-82000860 转 8325

责编邮箱：suyuanyuan11@yahoo.com.cn

印 刷：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5.25

版 次：201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：258 千字

定 价：48.00 元

ISBN 978-7-5130-0279-0/I·128(321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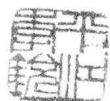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。

題周森旋《報告文學研究》

人民的事業需要報告文學

九三 李競



序一

裴显生

在写作学界，周森龙同志是一位勤于积累、善于思考、勇于开拓创新的猛将。在多次学术会议上，他的发言都新意迭出、富有挑战性，引起与会学者的注意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他的专著《别一种询问：写作是什么？》就对写作学理论提出一系列问题，有自己独到的见地。用张会恩教授的话来说：“这部书稿既是创造性思维的成果，也是启迪读者思维、发展读者思维的工具，对于写作学科的理论建树无疑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。”我赞同会恩同志的评价。后来他又出版了40万言的专著《现代写作论稿》，当时中国写作学会的几位教授对这部书有一个鉴定意见，其中有这样几句话：“该书理论层次高、框架新，不少论点新颖、独创……应该说，周森龙的《别一种询问：写作是什么？》和这本新著为写作学理论建设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。”这话经过了十年的检验，现在这本书已经被不少高校的精品写作课程编列为基本的参考书；森龙的一些学术观点也经常为学界同仁所引述，影响不断扩大。

近年来，森龙同志潜心报告文学研究，又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，写出新著《非虚构叙事艺术：报告文学研究》。承他信任，把书稿寄给我，要我提出意见，并为之作序。在我的教学生涯中，前三十年教文艺学，后近二十年教新闻传播学，也写过几篇论报告文学的文章，但没有系统研究过它。这一回，读完森龙同志的新著，对报告文学及其写作，又有了新的认识，获益良多。在我看来，这是一部内容扎实、富有新意的力作，具有毋庸置疑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。

报告文学在进入21世纪的头十年，确实走势低迷，出现了“生存艰难”的尴尬局面。对此，在“衰竭”的原因和今后的前途上，出现了各种分歧意见。这是很正常的事。研究报告文学，不能回避这个问题，必须直面现实。

有一派观点认为：“报告文学的生存本身就是尴尬的。这种尴尬不是来自别的什么，就是报告文学这个文体本身”。黄浩、黄凡中两位先生的论文《报告文学：文体的时代尴尬——对报告文学生存的本体质疑》一文明确指出：“报告文学所以会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和 21 世纪初期出现生存尴尬，主要是由于其‘文体’上‘不三不四’的‘出身’造成的”，“现在，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，我们有必要把它交还给历史”。针对这一派的观点，森龙同志进行了反驳，全书第一章就是《时代诘问——报告文学的生或死》。他没有在书的开头就四平八稳地讲一般理论，而是面对现实，卷入了论战，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，而且把它贯穿全书。通过对具体问题的辨析，他明确地指出：“面对报告文学的暂时低迷，不必大惊小怪”，“保持信心，辉煌可待”。他批驳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不共戴天的观点，指出人民的事业需要报告文学，报告文学一直恪守着时代责任和社会使命，在现代传媒技术环境下积极发展、不断调整。它不会退出历史舞台，而将走向辉煌的明天。我以为：这样的讨论是有益的，有争论才有前进，真理愈辩愈明，要相信读者会在不同意见中汲取有价值的见解，作出自己的选择。

作为一部报告文学的专著，自然要对报告文学本体作出剖析。这部新著在第二章源流理论，考察了报告文学生长的土壤，勾勒出它的发展轮廓，在介绍各家看法的同时，也写出了自己的见解。在第三章特性论中，在对 20 世纪 30 年代到今天的各家观点进行历时的介绍和评析后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：“报告文学作为报告必须保住它的非虚构性或曰新闻性”。“报告文学作为文学”，有自己的艺术性格，讲究文学的审美意蕴和艺术表现。在具体论述中，有不少独到的见地。应该说，报告文学是新闻和文学结合的产物，兼有两者的长处和特点，又有所不同。森龙同志把它定位为“非虚构的叙事艺术”，我看是很有道理的。这里，我想特别提一下第四章《争议命题：报告文学的真与伪》。“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”这一论断，是大家的共识，但多年来对如何理解报告文学的真实，如何保证报告文学的真实性，却众说纷纭，争论不休。森龙不仅评述了各家的见解，而且具体分析了失实的原因，提出如何保真的见解，如关于想象与虚构，报告文学拒绝虚构，不排斥想象，要十分注意发挥想象的作用，但又不能滥用想象，必须原样保证事物的客观性。对于如何保证具体材料的真实性，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。这也是书的新意所在。

森龙同志是长期从事写作教学、研究的学者，他研究报告文学，自然会

重视写作。全书十章中有六章论写作，涉及选题、采访、叙事等诸多方面。他没有泛泛地谈写作，处处突出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个性，使这部著作区别于其他同类著作。我想特别指出的是，森龙同志用叙事学的视角来探讨报告文学的叙事策略、叙述结构、非叙事话语，作出具体的阐述。这可看作全书的亮点，具有开拓、创新意义。书的最后一章谈人物报告的写作经验，这绝不是“画蛇添足”，而是在“解剖麻雀”，通过论述这一文种的写作，来体现全书的内容，让读者更深切地了解全书，可以视为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这是一部富有新意的著作，体现出作者敢于开拓的理论创新勇气和厚积薄发的科学求实精神。在这本书交付出版社正式出版时，我表示热烈的祝贺。同时，也希望森龙同志继续开拓前进，把自己提出的一些见解进一步深入探讨，使之周密、完善，把一些该说的话说深说透。我相信，在森龙同志和众多有志之士的共同努力下，报告文学研究会不断推出新的成果。报告文学这个独特的文体会健康发展，铸造新的辉煌！

2009年12月30日
写于南京秦淮河畔寓所

(注：作者系南京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所长、新闻传播学系教授，中国写作学会前会长)

序二

章罗生

周森龙教授的专著《非虚构叙事艺术——报告文学研究》即将出版问世，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，更为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理论研究又有了新的收获与突破而欣慰！森龙兄让我为之作序，虽然我自知不堪此任，但却愿借此机会，在表达我由衷的祝贺与敬意的同时，再次热切呼吁：必须高度重视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！

报告文学自诞生以来，虽历经风雨、坎坷曲折，却在时代的呼唤与社会的期盼中奋然前行。尤其是新时期以来，它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、兴旺蓬勃，展现出广阔的前景与雄强的活力。然而，有人却无视这一客观事实，一再断言报告文学“恐龙已死”、其“历史任务已经完成”，等等。我认为，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，除论者未认真阅读和全面了解报告文学的创作“现实”外，关键是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落后所致，即报告文学理论先天不足、后天失调，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又受到问题报告文学、史传报告文学和生态报告文学等各种流派和许多具有“前卫”品格的作家作品的挑战。因而，报告文学的内在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复杂，人们更搞不清“虚构”与“纪实”、“文学”与“新闻”以及“生活”与“艺术”等究竟是何关系、它们能否统一，等等。实际上，这些都涉及整个文学观念的革新与文论体系的“重建”等问题。而这些悲观论调的出现，正反映了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观念革新与文论“重建”的势在必行。显然，简单地一断语或采取“不承认主义”，只图眼前痛快和一时“惊人”，是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；只有面对现实、勇于担当、积极建设，才是我们应取的正确姿态。正是在这里，我们见出了《非虚构叙事艺术——报告文学研究》及其作者的学术风范与独特品格。即作者不仅有直面现实、迎难而上的学术勇气，而且有坚持真理、敢于批判的独立精神。本来，“自由之思想”与“独立之精神”是王国维、陈寅恪等老一辈学者留

给我们的宝贵财富，也是学界所一再推崇的学术精神。然而，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与评论中，这种精神却越来越淡薄了，常见的多是唱赞歌、说好话、“为尊者讳”，而不敢进行面对面的批评与反批评。尤其在当代文学等研究领域更是如此：由于面对的大多是健在的熟人或朋友，批评者更顾忌其对象的“面子”与“雅量”而不敢“碰硬”。而本书作者不然：他开篇第一章就以“时代诘问”为题，指名道姓地亮出其批评对象，对“死亡论”等进行针锋相对的具体批驳，并严肃指出：“学术需要民主，需要客观事实，它崇尚标新立异，但不必篡改事实，耸人听闻”；“任何消极悲观，甚至幸灾乐祸地为它唱挽歌，历史会证明这是一种草率或失态的表现！”不仅如此，在以下各章中，作者也能立足学术前沿，与各“名家”进行商榷、对话与交流。如在第二章考察报告文学的“源与流”时，认为张春宁与笔者的分期虽“比较细致”，但也“比较机械”，“往往把现存状况当做一个孤立且独立的整体来看待”，尤其是张春宁：“前后描述的角度是不一样的，内部的自恰性成问题”。我认为这些意见是很中肯的。如我在《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》中将20世纪90年代视为“成熟、自觉期”，确有不够严谨、值得商榷之处。正如阎纲先生在某次会上所说：如同果子，它成熟后就必将坠落。现在看来，报告文学的确仍处在动态发展的“过程”中，其中长篇“纪实文学”——“史传报告文学”以及生态报告文学与“特稿”等，就是其值得重点研究的突出现象。事实上，我在后来的文章中，也有意识地修正了此观点，至少在“成熟”前加了“逐渐”或“逐步”等修饰语。因此，我认为，真正的学者是应该敢于批评与欢迎批评的，真正的学术也只有在批评与争论中才能得以发展。试问：如果没有真正的“百家争鸣”，哪来学术的繁荣与理论的进步？作为整个学术研究是这样，作为理论严重落后的报告文学研究就更是如此！实际上，我认为，作为报告文学研究的学者，他应该和真正的报告文学作家一样，也是一种代表社会正义良知、“铁肩担道义”的知识分子；他应该也以学术为利器，参与民族、社会的思想、文化与道德建设！而本书作者就在这方面做了一次难能可贵的“身体力行”。

其次，与此相连，我认为本书第二个值得肯定的优点与特色，是其内容的全面、资料的翔实与论证的严谨，即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与“研究”特色。就内容的全面而言，除第一章有针对性地专论报告文学的“生与死”即生存与发展问题外，它在以下各章中分别论述了有关报告文学的“源与流”、“性与体”、“真与伪”、“灵与质”、“道与艺”与“情与思”等，实际包括或涉及

报告文学的本体论、发展论、创作论以及与此相关的真实论、题材论、叙事论等。就资料的翔实而言，它不仅旁征博引、追根溯源，而且立足前沿、详加辨析，力求在对比中发现新见，在总结中超越前人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为了使论述明晰有力，它还使用了大量图表和数据。与此前出版的刘雪梅的《报告文学论》相比，此作虽然没有专论“价值论”与“美学形态”等，但它在深度、系统性和资料的翔实等方面显然超越了前者。同时，由于它晚于前者十来年，因而它在文本资料方面能更多引用新近之作，尤其是能与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、对话，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有所提升和发展。不仅如此，本书比刘著有所超越也更见特色的，还是在写作论方面。刘著虽然也用了两章来进行写作学方面的论述，同时也谈到其主题、选材、结构、语言和人物、事件、问题等报告文学的分类写作，但本书在其十章中，则用了六章来论述其选题、采访、构思及人物类写作与叙事策略等。其中不仅具体辨析了报告文学的“文学性”与“新闻性”、“真实性”等方面的差异，尤其是在“怎么写”方面更见系统、深入与细密。如谈到“非叙事话语”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特点之一，谈到“两类非叙事话语文本的差别”；谈到人物报告方面的“三个转折”、“三重变奏”与“三种文体的影响”；谈到其“写人艺术”是“重性格”、“尚冲突”、“贵细节”与“肖声口”；谈到其“性格驱动”与“主题先导”等。总之，在这方面，的确显示了作者作为写作学学者的优长与强项，该书也的确具有可操作的报告文学写作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意义。此外，“学理性”特色还表现在“史”的观念贯穿全书等，即专著每一个论题，总是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”说话，有较充分的文献回顾和较清楚的学理脉络，所以见出必然，也见出扎实和力量。

再次，由这“较强的学理性与‘研究’特色”带来的必然结果，是新见迭出。例如，关于报告文学的性质，作者在历史的叙事中见出其发展与变化，引出了四点不同凡响的认识；关于报告文学的真实性问题，作者有理有据地否认了一些人理解的全是“文学性”惹的祸的观点；关于报告文学的采访，以前都只是从技巧与经验的层面来谈，本书则指出了其理论与方法的背景；在论到人物报告文学接受了三种文体的影响时，特别指出了现代小说与新闻通讯对报告文学可能有的负面影响等。这些也都是作者的创新与颇见功力之处。

该书还有一些值得肯定与提倡之处，如章节结构的整齐、匀称，语言文字的简洁、清晰等。

当然，任何学术研究和成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，其突破与超越也只是相对而言。如从更高的标准来要求，该书也存在某些需要继续提升与改进之处。如作为“报告文学研究”的题旨来说，其“研究”主要侧重在写作学方面，还未涉及其价值功能、评价标准和作家论、流派论等；其本体论方面还未构建完整的创新体系；对现实创作的整体把握还不够全面、深透，其图表、统计所依据的多限于报刊发表的中短篇，而对单独出版的长篇重视不够，因而对新世纪以来报告文学处于“衰竭”的结论值得商讨；同时，对文本资料的引用也有不够全面、广泛之嫌，等等。当然，以上所提，尤其是报告文学创新体系以及价值标准、现实把握等方面的问题，并不是作者一人，也不是《非虚构叙事艺术：报告文学研究》一书所能完全解决的。作为一个主要从事写作学研究的学者和一部只有 20 多万字的专著，能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奉献出如此内容扎实、特色鲜明、新见迭出的成果，已是值得特别庆幸之事。它的出版问世，不仅为极端贫乏、落后的报告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福音，而且也必将为推动报告文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。因此，我的以上看法，与其说是该著的局限与不足，倒不如说是对报告文学研究的期待与希望。总之，构筑报告文学研究的理论大厦，改变报告文学创作辉煌与理论滞后的现状，重建包括报告文学理论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、符合创作发展实际的文论体系，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界同人义不容辞的责任！

(注：作者系中国当代研究会纪实文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、湖南大学纪实文学研究所所长、文学院教授)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一 | 1 |
| 序二 | 1 |
| 第一章 时代诘问：报告文学的生或死 | 1 |
| 一、一派否定观点 | 1 |
| 二、一个基本判断 | 2 |
| 三、一些习惯误会 | 5 |
| 四、一种荒谬假设 | 8 |
| 五、一个简单结论 | 12 |
| 第二章 历史回眸：报告文学的源与流 | 15 |
| 一、渊源考：报告文学的生长土壤 | 15 |
| 二、路线图：报告文学的发展脉络 | 20 |
| 第三章 基本图谱：报告文学的性与体 | 34 |
| 一、特性说：简短的历时考察 | 34 |
| 二、新闻眼：报告文学作为报告 | 43 |
| 三、审美观：报告文学作为文学 | 49 |
| 第四章 争议命题：报告文学的真与伪 | 57 |
| 一、真实性论争回顾 | 57 |
| 二、失实的原因 | 65 |
| 三、保真的选择 | 67 |
| 第五章 选题关键：报告文学的灵与质 | 81 |
| 一、时代精神与文学潜质 | 81 |
| 二、“我不能换掉我的眼睛” | 87 |
| 三、于“司空见惯”中发现 | 89 |
| 第六章 行走天下：报告文学的跑与问 | 93 |
| 一、“行走的文学”观 | 93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二、理论与方法的来源 | 94 |
| 三、相对而言的特点 | 96 |
| 四、采访与调查的程序和方法要点 | 99 |
| 五、个案：情感·效率·机智 | 109 |
| 第七章 叙事策略：报告文学的道与术 | 114 |
| 一、叙事学的眼光 | 114 |
| 二、趋同的模态描述 | 118 |
| 三、叙事策略说略 | 124 |
| 第八章 构思技巧：报告文学的变与常 | 143 |
| 一、众语所归：已有共识 | 143 |
| 二、唯一原则：美的建构 | 148 |
| 三、基本方法：牢笼百态 | 149 |
| 第九章 我自言说：报告文学的情与思 | 160 |
| 一、非叙事话语：文本特性之一 | 160 |
| 二、非叙事话语的功能 | 163 |
| 三、非叙事话语的特点 | 169 |
| 四、两类非叙事话语文本的差别 | 172 |
| 第十章 人物报告：写作经验的例与则 | 176 |
| 一、消长的脉络：人物报告的三重变奏 | 176 |
| 二、他者的投影：三种文体的影响 | 183 |
| 三、关注的重点：写人艺术的基本方面 | 194 |
| 四、样本的对比：“性格驱动” VS “主题先导” | 210 |
| 主要参考文献 | 221 |
| 后记 | 225 |

第一章 时代诘问：报告文学的生或死

一、一派否定观点

黄浩、黄凡中先生在《北方论丛》2009年第1期发表《报告文学：文体的时代尴尬——对报告文学“生存艰难”的本体质疑》一文（以下称“黄文”，所引皆不另注），勇敢宣布“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，我们有必要将它交还给历史”^[1]。

这种声音不是黄文第一个发出的。早在5年前李敬泽就指出“报告文学（或纪实文学）在遗忘中老去并且枯竭”，他宣布：“让我们确认‘恐龙已死’。”并且发出悲悼：“这个文学中的庞然大物曾有过强健的生命，但在急剧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生态中已无法生存……”^[2]

吴俊在《也说“报告文学”身份的尴尬》中“基本认同”李敬泽的观点。

那么，导致报告文学“死去”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上述学者都认为是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惹的祸。李敬泽说它的根本症结是“在叙事伦理上是不成立的”：“任何一种文体都预设着作者、作品、读者之间久经考验的伦理关系，看一篇新闻时，我们确信记者必须为它的客观‘真实’负责，否则会被老总开除；读一部小说时，我们知道这是被豁免的‘谎言’，小说家有权利以虚构想象世界，而报告文学呢？它既承诺客观的‘真实’，又想得到虚构的豁免，天下哪有这等左右逢源的便宜事？”

吴俊进一步发挥。“报告文学的最根本特性在其纪实，否则就无法安身立命。”“在报告文学中，文学并不构成其本源性的基础和条件，而只是一种纯粹的修辞技术，充其量是一种附庸的外衣。一旦文学反客为主而成为报告文学的主要构成，那无异于是宣告了报告文学的灭亡。”“文学的特性在虚构和想象……甚至于可以最彻底地说，文学意义中是不存在所谓纪实的。……

但对报告文学来说则刚好相反，它绝不容许虚构，只能纪实，而且纪实的内容必须能够完全落实在事实上。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文体特性，为什么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要顽固地把它们捆绑在一起呢？”^[3]

而黄文的“本体质疑”并没有新的发明，也是说报告文学所以会有生存尴尬，以至今天要它“退出历史舞台”，“主要是由于其‘文体’上‘不三不四’的‘出身’造成的。由于这种既文学又非文学，既新闻又非新闻的本性特征，客观上造成了社会接受的价值障碍”。

他们把出的症结都一样：真实（纪实）性与文学性不共戴天。是文学性谋害了报告文学自身！

果真如此？

二、一个基本判断

我首先要说，报告文学确实有衰竭之态，确实“走势低迷”^[4]，被“边缘化”^[5]了。下图是从上海图书馆的《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》中检索出来的1976年至2006年（新时期以来）报刊上的报告文学的产量统计。要说明的是，这并不是报告文学的全部统计，例如，图书就不在统计范围，而这又是近几年比较普遍的现象。还有因图书馆员掌握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》分类标准的差异，导致有一些出入。但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掌握其整体情状。



1976~2006年期刊所刊报告文学作品产量统计

统计结果表明：31年时长，总计为25 989篇，平均每年约838篇。从图示可以看出：开始一路走高，到1988年形成一个高峰，之后出现了一个波谷，但毕竟是高峰中的波谷，只有1991年跌破年均线。之后在1999年又形成高峰。2000年还在年均线之上，2001年之后则可用“一落千丈”形容

之。总之，2000年前，可说是上升和繁荣的态势，1991年的下跌，可看作“衰竭”的信号，真正“衰竭”应该是从2001年开始的。

为什么信号在1991年发出？笔者认为，可以解读为社会政治生活的综合反映。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，一方面，曾以政治改革作为强力诉求的报告文学基本噤声；另一方面，改革开放一时处于停滞状态，简直有左派复辟的危险，直到邓小平南行讲话之后才上路；而报告文学作者的写作策略调整也有个过程。不过旋即调整过来了：市场经济的转型，一方面让报告文学往广告文学靠；另一方面，除政治议题外的一切文化、教育、历史、社会、生态、经济、军事等议题均成为报告文学的题材，一时风云蔚起，漾成高潮。

而之所以在2001年开始“衰竭”，如果从写作主体的身上找原因，王晖的看法无疑是对的：“粗鄙化与粗糙化，是当下文学为人所诟病的顽症之一，报告文学也不例外。在我看来，这一文体的粗鄙化主要体现在其趋利与媚俗等方面。趋利，即相当数量的作品，甚至是发表在著名的、权威的期刊上的作品大抵都逃不脱为金钱写作的干系……而粗糙则显示出报告文学作家质素的低下、艺术营构能力的缺乏。”^[6]另有学者也指出“相当数量的‘报告文学’只能说是假冒伪劣的文字产品，它们既算不上‘报告’，更不是‘文学’。”^[7]黄文也认可了这个判断是“相当准确的”，“说出了当下时代里‘一个普遍的文学秘密’”。但是，趋利与媚俗并不是从2001年后才有的，可以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有，只不过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这一时段更为突出和嚣张罢了。

“利润”这只野兽正改造着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文学的命运。我们只要看一看中国文学期刊的封面和目录，便可见出端倪。除极少数还在坚守所谓“纯文学”的理想外，大多数已成功完成了商业化转型，像电影追求“票房”，电视追求“收视率”，网络追求“点击率”一样，期刊追求“发行量”，推出了各种收费发表文章的“刊外刊”（子刊、专号、增刊等）。某出版社的《报告文学》不也在2004年“主编辞职”引出风波^[8]后，2008年年底又曝“公开卖稿，千字千元明码标价”^[9]的新闻，把业界“潜规则”抖了出来？

文学已经进入“小众化”时代。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，作家比读者多。相反，电视覆盖率和人们花在电视机前的时间却迅速增加。据中央电视台委托国家统计局每5年进行一次的“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”2007年度报告结果显示：内地电视观众总数为12.05亿人，比20年前第一次调查时

观众增加了一倍；95%的人几乎每天看电视，而且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都在3小时以上，比5年前增加了半个多小时。还有93.72%的调查对象表示，看电视是自己闲暇时最主要的生活内容，这一比例也比5年前有所增加。^[10]与此同时，互联网在中国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，据DCCI 2008年上半年调查数据显示：2008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有效受众规模继续快速增长，成为网络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。2008年上半年中国互联网有效受众规模达2.21亿，该数字比2007年全年的1.82亿增长21.4%，预计2008年全年中国互联网有效受众规模将达2.63亿。^[11]这些应该都是昔日文学的读者，现在都成了电视和网络的受众。文学的边缘化命运实在是势所必然的事，报告文学岂能独善其身？

报告文学数量的萎缩是不争的事实，不如以前受到读者欢迎甚至可说是被冷落也是不争的事实，那么，它是接近寿终正寝，还是暂时的低迷？黄文认为无疑是前者，而我则认为是后者，不必悲观。证据如下：

其一，报告文学一直恪守着时代责任与社会使命，坚持在它的岗位，好作品从来没有断过。以2008年为例，陈启文的《南方冰雪报告》，朱玉的《天堂上的云朵》，李春雷的《木棉花开》，张胜友的《东方的觉醒：珠江故事》，吕雷、赵洪的《国运——南方纪事》，何建明的《1978：春雷响起的地方》，孙晶岩的《奥林匹克的中国盛典》，王敬东的《超越》，谭杰的《关于“制造”姚明》等均为影响巨大的力作。其中犹以《木棉花开》为著，它先后被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新华文摘》、《南方日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、《文学报》、《读者》等十多家报刊转载和选载。就像20多年前，中共黑龙江省委、吉林省委接连发出通知，把《三门李铁闻》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“整党材料”一样，《木棉花开》也被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同志批示，以省委办公厅参阅件第3期的形式向全省干部推荐阅读。一些地方的党政部门还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学习、研讨和征文活动。这在新时期的文学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。好像要给“把报告文学还给历史”论者当头棒喝似的，有人把2008年称为“辉煌的‘报告文学年’”^[12]，我认为当之无愧。

其二，报告文学自身也在现代传媒技术环境下积极发展、调整中。文学的边缘化危险不仅指读者的阅读兴趣不在文学或者媚俗趋利，其中也包括被现代传媒边缘化。网络时代也在改变着传统的文学。报告文学是社会生活“感应的神经”，同样也对它自身的生存环境有着敏锐的感应。它已经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利用现代技术和各种传媒了，例如出现了影视报告文学（《寻找